

新书

《博物馆书》

赵玫 著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关于域外博物馆的书籍。是作家赵玫近二十年间在全球各国参观各类博物馆的结集。其中不单单介绍了众多各具特色的博物馆，更多的是作者在游历过程中的独特感受。尤其每个博物馆所承载的历史沧桑和独特气质，以及渗透其中或感人、或忧伤的人物和故事，都将成就读者奇妙的纸上文化之旅。

【精彩摘要】>>

死亡也不能将他们分离

这个小镇叫Salem。被译成“萨勒姆”。也有译作“歇冷”的。“歇冷”的名字很好听，有点像当年徐志摩将佛罗伦萨翻译成“翡冷翠”。翡的冷的翠。我猜那一定承载着徐志摩时代的忧伤。不过我宁可将这个小镇称作塞勒姆，因为这几个字和Salem的发音最为接近。于是就塞勒姆，这座马萨诸塞州北部的优雅的小镇。宁静而神秘的，有着古老英国乡村风情的。

塞勒姆在波士顿以北不远的地方。同样在大西洋沿岸的一个港湾里。那港湾很美。透过霍桑家晦暗的大房子就可以看到。海上的一片明朗会陡然驱走霍桑故居中的那种说不出的压抑。停泊着无数游船的码头伸向蓝色海湾。点点白帆在海浪中逶迤摇曳。那，隐藏在帆影背后的神秘桅杆。

塞勒姆所以著名，不单单因为这里是霍桑的故乡。尤其对那些来此游玩的孩子们，女巫和女巫的猫才是最令他们兴奋的。这里不仅盛产女巫，同时还以绞杀女巫和女巫的猫而青史留名。据说1692年前后，塞勒姆有十二位年轻女子被诬指为女巫而被活活吊死。于是走在塞勒姆清冷的街道上，会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女巫所特有的神秘气息所环绕。人们便也莫名地紧张起来，甚至疑神疑鬼，那种收紧心脏的感觉就仿佛在看充满了悬疑的惊悚影片。你从街边的任何一家小店走过，即或不朝里面看，也能感觉到女巫眼中闪过的那奇怪的光芒，甚至能依稀听到女巫和女巫的猫在濒死时发出的那凄惨哀号。于是你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奋力逃离，唯恐被商店里女巫伸出的手臂抓住。不过你最终也不会知道来抓你的，究竟是女巫本人，还是被绞死的那个女巫的灵魂。

在美国，任何小镇的得以彰显，大多是因为小镇中所独有的文化主题。或者这里曾走出总统，或者这里曾是战场；要么这个小镇住满了同性恋，要么这里有某位要人的夏宫。诸如此类。于是整个小镇的运转都围绕这个主题，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所以只要在小镇走过一遭，你就不可能不记得这个小镇以什么著称于世。而最直观地告诉你这个小镇文化的，就是沿街商店中出售的那些主题商品。

塞勒姆也自然如此，镇上几乎所有的商店都遍布着阴森恐怖，以配合女巫这个可怕的主题。活着的或者被绞死的女巫充斥着商店的各个角落，甚至弥漫在小镇的空气中。这些女巫的形形色或天仙般美丽，抑或丑陋如妖魔，总之鬼魅的表情诡异的目光。而手臂和手指又总是被设计成长长的，向前伸着，让你觉得你将随时成为女巫的囊中之物。

去看霍桑的故居一直是我的期待，就如同1994那年访问美国，拜谒威廉·福克纳的家乡是我的愿望一样。尤其是读了女儿十六岁那年在美国写的《有七面山墙的房子》后，我就更加期盼着这个被女巫和霍桑萦绕的神秘小镇了。

【作者简介】>>

赵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自由谈》杂志编辑部主任，天津市作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15部，中、短篇小说集4部，散文随笔集9部，计500余万字。赵玫的作品曾连续两次获得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1998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天津市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奖。



▲《博物馆书》▲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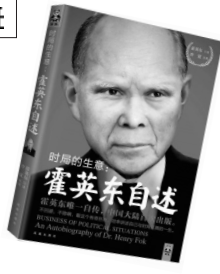
热读·连载/新书

连载

13

凤凰出版社

霍英东的一生，伴随着东亚政局数十年的风云变幻。本书真实、详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霍英东对亲历往事的追忆，对敏感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内容涵盖东亚近几十年几乎每次重大变化的细节内幕，亦处处流露出霍英东一生洞察时局、捕捉商机的大格局、大智慧。



我是地盘拍卖的活跃分子

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它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三十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九十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黄埔船厂、太古船厂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外国兴起戴假发，香港即刻出现几千间假发厂；塑料花厂也一下子剧增到几千间，产业工人由几万人增到近百万人，工厂几万间。银行、工厂、写字楼、旅游业等样样都离不开房地产。

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建筑业、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旅游、商业、金融业的繁荣，使整个香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

我们首创的分层出售楼宇、“卖楼花”、编印售楼说明书等经营手法，都是对地产经营方法的重要革新。正是这几种全新的经营手法的实施，给沉闷的、冷冷清清的香港地产市场注入了一股活力，香港地产市场因此出现前所未有的勃兴景象。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香港仍以帆船为标志。但到了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的推行，短短几年间，高楼大厦遍布港九各地。据统计，从1954年至1960年，香港新建的楼宇不少于一千栋，高楼大厦终取代帆船而成为香港的新标志。

可以说，没有“卖楼花”等经营手法的推行，香港的地产市道不可能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象；而若果没有兴旺的地产业的带挈和催化，香港经济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后期就迅速起飞。继蟾宫大厦和文逊大厦之后，1956年，我在铜锣湾同时兴建希云大厦、礼顿大厦和加路连山大厦。

1957年，我又建成东庐大厦、礼加大厦和礼希大厦。这些楼宇，都是采用“卖楼花”方式推销，结果都被买家抢购一空。

我卖了四方便、香槟大厦和蟾宫大厦之后，震动香港。起初，关启明他们发展的侨丰大厦，开始学我们“卖楼花”，接着又用同样方法发展尖沙咀的海景大厦。

从此，香港地产界变得疯狂起来，个个不要本钱，登报纸“卖楼花”，就收买家的钱，利园山、九龙仓、渣甸货仓、尖沙咀、土瓜湾等地盘被人抢购，陈德泰买了不少纱厂地盘，廖宝珊大量购入西环一带的地皮，张谨记买百乐新街……个个争着抢地盘。

为了鼓励地产商兴建楼宇，缓解市民住房紧张的困局，港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拍卖不少官地，供地产商竞投。我是地盘拍卖场上的活跃分子，经常是一个人独力竞投。当时，随着地盘拍卖会频繁举行，地产界出现了一种俗称“食饼仔”的现象。

所谓“食饼仔”，其实就是地盘拍卖过程中的一种投机行为。比如港府要拍卖一幅地，A可能是独力竞投，B可能也是独力竞投，C可能是几个人合作竞投，有实力的就独资，没实力的就几个公司合伙叫价，D根本无心买地，却也来凑热闹参与竞投。这幅地本来一千万才可以投得，没有这一千万的人，一般不敢叫价，因为若真的投到，拿不出钱来怎么办？于是，有人就找后援，姨妈、姑姐也叫出来。好啦，开投了，假如A、B、C、D四方竞投，从五百万开始叫价，六百万、七百万，叫到差不多的时候，当中就会有人即场商量：“不如我们投回来再投过啦！”于是大家来了妥协，某方叫到七百五十万时，另外三方就不叫价了，七百五十万成交。之后，A、B、C、D四方随即找个地方坐下来，重新把这幅地拿出来竞投。好了，再次叫价，叫到九百万时，C、D不叫价了，只剩下A和B。九百万和七百五十万之间的差价一百五十万，四方平分，每方分得三十多万；接着，A和B再竞投，A叫价九百五十万，B可能就放手了，这幅地最终由A以九百五十万投得，而九百五十万与九百万之间的差价五十万，再由A和B平分，每方分得二十五万。

整个过程，就是大饼分小饼，你吃一块，我吃一块，大家都有好处。A以较便宜的价钱投得地盘，其余三方也得到利益。当然，也有例外的時候。比如A、B、C、D是一伙的，但突然有个E出来，E老是去顶，叫高价，把地价顶高，结果最后投得地盘的人就要出高价钱了。既然“食饼仔”对每一个竞投者都有好处，那地产商又何乐而不为呢？那时，几乎每一个地产商，都或多或少参与“食饼仔”，此风极为盛行。连廖宝珊，最初不参加“食饼仔”集团，老是想叫价，顶那些人很厉害，但最后也加入。

但是，此举却使地盘的拥有者得不到一个合理的价钱。港府的不少官地在拍卖时也被地产商联手“食饼仔”，而使得成交价偏低，政府库房收入因此大为减少。
 这种事，最初没人理，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政府发现不对头，说这是不合法的，要加以限制，竞投时，不允许台下的地产商讲话、商量，并且搞到几乎要抓人。我记得，当时我还就此事对港府讲：“其实很简单，政府可以不公开拍卖，不给减价，用暗标竞投，就不会有饼仔食。”但政府可能认为用暗标竞投，地价投不到这样高，结果还是减价，还是“食饼仔”。

地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香港一种新兴的行业，不少人因此也跃跃欲试，以期在短时间内赚得钵满盆满。一些人甚至想与我“埋堆”，在地产行业分一杯羹。
 大约是1956年，即我卖完希云大厦、礼顿大厦、加路连山大厦的时候，李康节等人主动找上门来，对我说：“霍生，你做地产生意很赚钱，不如我们一齐玩啦！”

李康节当时与我并不相熟。他原是搞建筑的，看到我经营地产赚大钱，于是想与我“埋堆”，一起做地产生意；但苦于与我并不相熟。后来，他联络了我的一些朋友，包括朝鲜战争时曾与我做过运输生意的那些人，一起找我，希望合作。
 我认为跟李康节等人合作，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于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要求。

关注民生
服务大众

本報晚報
本版编辑/房冀

23

118

连载

海天出版社

1900年春，义和拳重镇山东鲁西县，拳民教众火拼，杨家将后代揭竿而起，中国功夫遭遇西洋火器，一路北上，最终命归何处？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为何从观望、利用到镇压？百年后我们再看这段历史，是沉重？还是荒唐？是喜剧？还是悲剧？

这个王朝离着终结不远了

就在疯老婆子下喻宣战的一瞬间，但见光绪皇帝暗暗地滴下两行绝望和无奈的泪水。毫无疑问，光绪是坚决主和的，无奈他身为傀儡，其时已无半点话语权。《庚子国变记》曾纪录了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光绪帝与载漪的一段对答，足见其态度是何等明确：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载漪言董福祥善战，剿回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戮也。帝曰：“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

为显示与洋人决战到底的决心，慈禧太后遂于七月初四日，对于再次以死相谏坚决主张镇压拳匪乱民的袁旭、许景澄着即“矫旨捕斩”。当时，慈禧实在说不出什么杀人理由，只得在袁、许两人被杀的第二天，在上谕上含糊地批道：“太常卿袁旭、礼部侍郎许景澄，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多语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袁旭、许景澄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七月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

大家看，这叫什么理由。这就难怪，不久后，两位重臣很快得以平反了(次年十二月，光绪帝下诏，将诬陷被杀的太常寺卿袁旭、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永仪开复原官，并录用三人子嗣。宣统元年又下诏追谥袁旭为忠节，许景澄为文肃，徐永仪为忠烈)反是平了，可人头没了。人都没了，这反平了又有什么用处(中国的一部千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平反史。没事就平着玩呗)

当历史演绎到这一步时，任何人都已无回天之力。就像面对滔天的洪水，你只能是坐着毁灭性的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你卷来。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瞬之间。你连喊声上帝的空都没有(不在教的就得喊娘了)。

可悲可叹的是，整个庙堂之上，百官之中，只有光绪皇帝和仅有的几个主和大臣独坐一隅，暗自垂泪。因为他知道，大清朝完了。如今，百年已过，我们仍然能从这位万人至尊的眼泪中，读出他当年的无奈和心酸。更可悲的是，这不仅仅是皇帝一人的悲哀。

晚清社会的一个重大特点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中央权威日渐衰微，各省地总督、巡抚虽不像东汉末年各地诸侯那样拥兵自重、自成一体，但对于朝廷的政令已经可以做到漠视或阳奉阴违。这在中国自秦以来的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的历程中是很少有过的。抗旨不尊，欺君之罪，忤逆作乱从来都是死罪。当一个王朝和他的最高统治者对此默许或装聋作哑时，这个王朝离着终结不远了。

如此充满魄力的宣战诏书，其下达的方式却令人不敢恭维，如前所述，由于京津的电报系统统统被破坏，紫禁城只好采取最古老的八百里急的土办法，由快马快递到山东济南，再由济南发往全国。

当北京来的“邮差”和他的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汗血马，一并大汗淋漓的踏进济南府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珍珠泉边悠闲的钓鱼：“噢，来了。先吃块西瓜晾凉汗。中午吃我钓的红烧鲤鱼。”“参见袁大人，小的身背朝廷的十万加急……”又钓上一条，这回的更大：“不急不急，到了咱山东就不急了，哈哈。”

当时的珍珠泉正是山东巡抚衙门所在地。这样至少可以保证袁世凯将刚刚点上的红尾大鲤鱼立刻就能送到同在一个院内的厨房。而他的屁股后边十步远的地方就是他办公的大书房。书房的一侧，就是电报房。就是这三丈小屋，才保证了整个庚子国祸期间紫禁城与全国各地、各地与各地之间的电报联系。如山东也杀洋灭洋拔线杆，那全大清的通讯联络恐怕就只能全靠八百里加急了。

与半年前召见吴神机时相比，袁世凯现在的心情可谓轻松多了。这段时间以来，袁世凯对山东境内的义和团残余毫不示弱，见苗头就砍，就像北京上的义和团砍洋人。不久前，青州义和团的著名领袖孙连开、刘殿元等，联络附近的几支义和团，从中选拔了精壮者100余人，准备“赴天津支援杀洋”。袁世凯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当地清军杨荣泰部，会同青州府对此“纠党情形”严行查缉。这一百人的队伍立刻玩完。同时，将对此事处置不当的益都知县崔焕文摘去顶戴，给青州知府李芳柳记大过处分。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意识到，要安定山东，就不能让洋人出事，洋人一出事，西洋便有出兵的理由。故在大沽口炮台失守，天津一片混战，北京全城乱砍的时候，他却立即训令山东境内道、府、州、县告知辖境内的传教士，赶紧带着家小来省城济南寄居，或是到沿海一带居住。同时又紧急飭令属下官员，给他们三天时间，将山东境内的洋人传教士和矿山、铁路上的洋人工作人员一律护送到通商口岸。当英国、美国驻烟台领事将二百多名传教士由小清河运往海口的时候，袁世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派兵保护每一批离去的洋人，还提供了很多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对于外逃至山东的洋人，袁世凯一样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和周到的保护。在袁世凯严密的保卫下，山东全省竟然没有一个洋人遇害！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当两个月后联军一举占领北京，并“四处剿杀拳匪”时，袁大人的善行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呢？请慢慢往下看……

义和风云

王金年